

第一章

青 少 年 时 代

第一节 我的家庭

我 1899 年 11 月 2 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鹿苑镇由一个十字形的街道组成，东街较短。我家住西街口外，距离常熟县城约 30 华里。

常熟一称虞山，又名琴川，风景优美，有东湖和西湖。这里读书的多，在清朝，有功名的人也多，仅次于苏州，出过六个状元。从鹿苑镇到县城有水路相通，进城常坐自家的船，30 华里的水程，却要花不少时间。

我的先人，曾祖父一辈，武人居多。书斋里有这样一副对联：“韬略一门，五登蕊榜；簪纓四世，六宴琼林。”说明这是个世代相传的官绅之家。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国家由积弱而濒于危亡之际。清廷腐败，列强欺凌。我家与清末的一位著名人物翁同龢家是世交，来往较密。翁同龢被遣返原籍后，我父亲常到虞山鹤鸣峰去探望他。通过翁同龢的关系，我父亲得以和南通张謇结交，张是翁的得意门生。19 世纪末，一般志士仁人对国事日非，无不痛心疾首。翁同龢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戊戌政变失败，翁因曾保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遭到慈禧嫉恨，被遣回原籍，并由常熟县令监视其行动。

我父名荃琛，字召诵，进学以后即放弃举业，经常往来于上海、

南京、北京之间 秉性豪爽，善与人交 挥金如土。我父亲对慈禧当权的清廷，甚为不满 认为军事、外交所以一败涂地 是由于国家贫弱 而要富国强兵，端赖振兴实业，因此在年过 30 以后，即热心于垦殖及工业。他和南通名人刘一山、陈楚涛订金兰之盟，共同致力于盐垦，打算开荒植棉 兴办纺织厂。

我父亲平生仗义疏财，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 1897 年他在上海时，上海道抓到三个反日的台湾同胞，日本领事馆要求引渡。我父亲很同情那三个爱国志士，为了避人耳目，在妓院里约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李平书（绅士）施德之（医生）等，一起拼凑了 10 万两银子，送到上海道那里，买放了这三个台胞。三个台胞中只知一个人姓林。被放出来后，他们就登上英国船去了英国。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听到说那位姓林的家住在台中。

1908 年，我还不满 9 岁的时候，为了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商量盐垦事宜，父亲从上海去南京 坐的是日本商轮“大福丸”。船行经镇江，忽起大火，船长和我父亲相识，就把自己的救生圈拿出给了他。父亲拿到救生圈就往水里跳，另有几个人也跟着跳入水中，但是他的随从却没有和他一起跳。后来在镇江江边沙滩上找到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无名氏的尸首。家中一连接到由上海、南京和镇江发来的三封告知父亲不幸遇难的电报，记得当时我正在书院读书，消息传来后家人匆忙把我接回家中。我刚一进门，就听到一片哭声，才知道父亲已不幸去世（享年 43 岁）。

父亲突然逝世，家庭经济大成问题。我家那时的家景并不富裕，常要借债。父亲的脾气是 借钱给人从来不要借据 可是借人家钱定出借据，而且每借必还。父亲逝世后，所欠的债由母亲出卖田产陆续偿还。以后伯叔等六人分了家，我们这一房经济困难，所有费用全靠变卖田产维持。当我从英国自费留学回来时，田产已变卖殆尽。

我母亲是清末文学家、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之孙女，龚家与翁

同蘇家也是世交。龚自珍字定庵，浙江省仁和县人。龚定庵的次子名陶字念匏，做过金山知县。我母亲是龚陶的独女，由翁家与曾任贵州巡抚的庞鸿书家介绍，和我父亲结了婚。

关于龚自珍 我想补充几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曾引用龚写的一首祭神诗，使这首诗在大陆广为流传，即：“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对龚自珍的诗文也特别爱好，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七言绝句，诗题“别好”：“江山代有才人出，胸次风云笔底驰。文艺生平两别好，石涛图画定庵诗。”《龚自珍全集》时常放在我的案头，每年出外度假，也是随身携带。近年更访得一幅龚的手迹，挂在客厅正中。1988年去杭州，恰值杭州市园林局请我共同确定龚定庵居住在杭州的旧址。经与当地老住户交谈得知，目前尚存的一套清末旧宅并非龚所有，但确系龚宅左近，因此辟为龚定庵纪念馆，我为纪念馆题了字。

1927年10月8日，母亲突然中风去世，我当时在南京供职，闻讯赴沪奔丧，悲痛逾恒，撰有《先妣龚太夫人行述》一文，以资纪念。全文录后：

先妣龚太夫人行述

先妣仁和龚氏，外曾祖定庵公，文名满海内。外祖念匏公世其学。先妣生而颖慧，幼从念匏公宦游四方，周知世务，年二十一来归先孝召诵公。先考在日，急公好义，奔走南北，家事一委之先妣。宾祭之供，盐米之琐，听宵黾勉，经理秩然。不幸先考中年弃养，先兄昌熙游学申江，以疾致夭。先妣既抱无穷之戚，复伤家嗣，精神怫郁，慈躬已不无耗损矣。然先妣洞明时事，恒以远志勸昌熙，命留学英国。在外六年，举凡风土之习，旅学之资，所以切慈怀而顾念筹维者，心力且交瘁焉。昌熙既毕业归国，先妣为娶嘉兴沈性元女士以为室，爱之如吾嫂吾

姊。嫂为江阴周雅亭女士 未婚而遭先兄昌煦之丧 矢志柏舟，入家侍姑。姊慧中则适南汇卫友松君。先妣以婚嫁粗毕，子妇承欢，慈怀稍豫。昌照数年前后赴绥远、察哈尔诸边地游历，关山万里，定省又疏，逐年服务首都，仍不克长依膝下。幸沪宁接轸，归省尚易。方冀吾母克享遐龄，优游岁月，略尽乌私，以报罔极之恩于万一，而孰知古人风木之痛，蓼莪之悲，竟丁于不孝之一身耶？呜呼痛哉！

先妣秉赋素强，先后育子女七人，四皆不育，迭更忧患 备极劬劳，晚年颇觉虚弱。去夏患病甚剧，旋幸医愈，戒家人不令昌照知也。秋间体健如常。十月八 日午后十时十五分 忽患中风，神色陡异。急迫医诊治，药石无及，竟于十时三十分长逝。昌照接电驰沪，已不及亲聆遗言矣。衔恤在疚 忽已一年 终大之恨，曷其有极。先妣明义达理，戚族中偶有争执，片言裁处，受者翕 服。自奉俭约，而因人施与不少吝，远近被惠，群颂 其慈。自疾起迄寿终，不逾一刻，毫无痛苦，知与不知，皆以为一生积善之报。惟昌照无怙无恃，愧然一身，生平志事，百不偿一，求所以稍慰吾亲在天之灵者，夙夜彷徨，诚不胜其鲜民之恻，而未知 所处也。呜呼痛哉！ 略摭哀悃，伏维矜鉴。

不孝钱昌照泣述

第二节 幼 年

我受启蒙教育比较早，4 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背诵一些五绝、七绝唐诗母亲每教一句，我就跟着念一句，并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五六岁时，母亲教我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我自从识字以后，看到什么书都喜欢翻阅。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次曾祖母见我和长嫂一起玩时，笑着对我说：“叔嫂不亲授呀！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多言惹是非（两句都是《闺门女训》中的句子）引起了哄

堂大笑。

1906 年我 7 岁时，父亲从上海震旦大学请来一位姓庄的老师教我法文。所以要我学法文，是因为他认为贫弱的中国需要培养一批外交官，折冲樽俎。当时各国政府之间，签订条约都以法文为依据。我有一长兄名昌煦 比我大 11 岁，父亲把他送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同时也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外交人才，因此聘请精通法文的庄老师来家执教。父亲去世后 家里经济困难 只能辞去庄老师，我的法文也就没有读下去。

另外还请过孙翔仲老师教我中文。孙老师后来留学日本，专攻哲学，回国后曾主持过上海爱国女学。还有一位孙绍伯老师，教我书法 先临魏碑 然后临摹颜字、欧字。再就是一位姓陈的老师教我打少林拳，同时练摔腿、八段锦这些中国传统的武术。这对我身体的健康成长大有好处。

在家乡我上过一段小学。那时本乡办了两所小学：一所在鹿苑镇的西街 是我祖母主办的，离家近，一所在东街 是伯父耕玉主办的，离家较远。我和堂弟昌祚（伯父耕玉的儿子）进东街小学，那里有三位老师 周暴峰、王彦门和刘礼门。周暴峰老师在常熟一带颇有文名，教国文，王彦门老师教数理，刘礼门老师擅长学校管理。伯父耕玉在北京当官多年，为人古板。鹿苑镇这两所小学常常举行比赛，参加比赛的不限于两个小学的学生，由伯父耕玉出题看卷子，我和昌祚常常得奖。

在小学时 我已熟读《论语》、《孟子》 但不甚理解其真实意义，后来进入中学，才逐渐懂得一些。

第三节 中学时期

我在小学读了一年半，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 年）我 11 岁，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堂弟昌祚也一同考入。南菁中学校长胡羽人，

是胡敦复的叔叔 办学认真、严格 学生都怕他。在南菁中学时 我更注意锻炼身体，参加过木球和台球比赛。我自觉臂力锻炼得不错。1912 年，暑假考完，我和一位比我年纪大的同学比臂力。我获胜，终因年纪小，比不过，右臂受伤 动弹不得。暑假中 母亲带我到常熟县城请骨科 医生治疗，经过两个多月，才得以痊愈。

在南菁中学我只读了 一年多。1912 年暑假后 和昌祚、昌猷、昌文 三个堂兄弟离开家乡 去上海投考浦东中学 均被录取。这年我已 13 岁了。

浦东中学是由有名的建筑工人杨斯盛用一生的积蓄创办起来的 礼堂上高悬“勤”“朴”两字。我进浦东中学的时候 杨斯盛已经过世校长是朱叔源，校董有黄炎培、沈恩孚等人。我在浦东中学读了五年那时的浦东中学与南洋中学齐名，是上海两所办得最好的中学我和昌祚，以及另名同乡王崇植入学考试成绩比较好 分在 甲班。我的文科 功课好些，昌祚理科好些，王崇植则文理两科都不错。王崇植以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参加张静江主持的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工作。抗日战争初期，我把他介绍给开滦煤矿总经理顾振顾去世后，王继任为总经理，一直工作到解放。

昌祚在浦东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中国最早学航空工程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参加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工作。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了好几所航空学校，都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昌祚任教育长，实际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当上 国防部长，昌祚任该部第六厅 技术厅 厅长 解放前夕随白崇禧去台湾。可能是由于我在大陆的关系，蒋介石对他不放心，调他搞外汇管理工作。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在远东开会的时候，一般由他充任蒋介石政府的首席代表。两岸航空界旧人员，多数是他的学生。数年前 他去美国 取得长期居住证 现住美国洛杉矶，已不大能行动。他的子女均住在美国，长女文采和女婿周昌曾经 回国 来看过我。中山大学曾聘周为名誉教授。

我在浦东中学读书时，校长朱叔源是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生，很有革命精神，坚决反对北洋军阀。他对我很好，介绍我认识黄炎培、沈恩孚、朱少屏、吴稚晖、钮永建等，我得到他们的帮助不少。

朱校长鼓励学生参加田径赛。他常对学生说：要革命，要报国，首先要把身体锻炼好。由于他的教导和鼓励，我对各项运动都发生兴趣，积极参加。1917年在扬州开江苏省运动会，浦东中学得学校冠军，我得个人第一。在学校足球队里，我是后卫。那时南洋中学有一位姓张的足球队员，外号“白兰地”，由于我对足球也有一手，同学们都称我为“小白兰地”。

朱校长为人和蔼可亲，我常到他家里去请教，这对我的思想极有帮助。他把中国的未来希望寄托在孙中山先生身上，常给我们讲一些孙先生领导革命的故事。那时我对革命的印象是模糊的，但对孙先生的学问与革命事业已有所认识。

浦东中学有几位老师，我对他们的印象比较深刻。

陈肇英，浦东中学体育教员，实际上是在搞革命工作，目的在于打倒北洋军阀。有一次他忽然不来上课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上海道把他逮捕枪毙了。我们不少同学，痛哭流涕。有一天晚上我们把全校电灯熄灭，在自修室里点上蜡烛，开会追悼他。

孙宗弼是位有名的“小学”家，与汪中齐名，精通《说文》，擅长诗词。他很喜欢我。我在浦东中学五年，中文试卷都是100分，这里有偏爱的成份。晚上孙老师经常找到他房间里为我讲解诗词，他教导我要少写律诗，律诗太拘束，要多写五言、七言绝句，填词方面他要我仿效苏东坡、辛弃疾。苏、辛词比较豪放。每次讲完，总要出个题目，要我做诗或填词，限定两三天内交卷。当我在浦东中学毕业时，孙老师要我为每个毕业同学题一首诗，我勉为其难。毕业同学纪念册载有这些诗，现在浦东中学图书馆里可能还找得到。孙老师还指导我学书法，先临魏碑，然后学颜、柳。1923年，我从英、美回国，立即到苏州去探望他。

沈励,南社有名诗人 是南社健将 也在浦东中学教中文。他写的诗词内容大都涉及革命事业 企图用诗词来唤醒人民。那时报上发表太平天国人物的诗词 实际上不少出自沈老师的手笔。在诗词方面,我也得到沈老师的帮助。1927、1928 两年 他和我同在国民党政府当秘书,我始终师事之。

朱庭祺 留美学生的前辈 在浦东中学教英文 其夫人胡彬夏有时来代课。浦东中学英文程度比较高 二、三年级就读《Robinson Crusoe》、《Vicar of Wakefield》、《Tales from Shakespeare》等书。朱、胡教书很严格 同学们对他们很敬畏 上课时 课堂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朱在抗日战争时期 任盐务稽核所所长 胡在文学方面相当有名,是胡敦复的妹妹。

吴玉麟 留美学生 在浦东中学教数学、物理 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记得高等代数中有 Remainder Theorem 我考卷上误写为 Remember Theorem。吴一看就扣了我 10 分 并且对我说:“这样粗心是不行的。”使我受到比较深刻的教育。吴是相当有名的工程专家,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戚墅堰电厂当厂长多年。

陆品琳,当时有名的足球大王,在浦东中学教体操和球类运动。我在中学喜欢运动,和他的教导有关。听他的话,我坚持跑步、练八段锦多年。

钱剑秋,学监 西江师范毕业 在上海相当有名。他对学生严慈兼顾,既像父亲,又像母亲。学生顽皮胡闹不行 他每晚都拿一个手电筒到各学生宿舍巡查。学生犯了错误,就叫去当面谴责,我们名之为“吃大菜”。通常他叫犯错误的学生到他房间单独谈话 不让别的学生知道。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有个学生偷拿了别个同学的钱,钱学监指定三人进行调查,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查明了偷钱的人。钱剑秋把他叫去,对他说 这次可以宽恕 再犯就开除 并嘱咐我们三人不要公开说出去。钱老师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对学生爱护备至。学校有三间病房,供有急病的学生治疗休养。我病过一次,深

感钱老师的温暖。

浦东中学的伙食费每月 3 元,比南洋中学、澄衷中学都差。学生穿着比较朴素,冬天棉衣外罩蓝布大褂,夏天白布衬衫短裤。

直到现在,我依然感到中学的环境、风气、训练对于一个人德智体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1918 年 6 月,我在浦东中学毕业,暑假中报考唐山路矿学校本科。我刚考完就病了,医生说是伤寒,经过半年的治疗和休养,才恢复健康。我在家养病的时候,忽接吴稚晖来信,说他在唐山路矿学校教中文。信里说,虽然晚了半年,学校还可以收我。病好以后,我去唐山见吴稚晖。我对他说,我不打算进唐山路矿了,想到英国去学经济。吴说:“很好,我的妻子儿女都在伦敦,你可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出国,这样可以省些路费,到巴黎后再转往伦敦。”1919 年年初,我回上海向浦东中学朱校长请教。朱校长同意我在学校暂住,补习英文和数理化,作出国报考伦敦大学的准备,我住在礼堂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由王季梅老师为我补习英文,吴玉麟老师为我补习数理化,课余我带着一批比我年轻的学生搞体育运动。关于出国的事情,朱校长要我去请教朱少屏(中国寰球学生会的主持人),朱告诉我,下半年有一条船去法国,我可以参加勤工俭学团体出国。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银元值钱,一英镑只值一块银元左右,家里卖了一些田送我出国。

第四节 出国留学

1919 年 8 月,我从上海动身。由于朱少屏的指点和帮助,出国以前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到。和我同船出国的张峻,为人慢吞吞,不着急。船已启碇,他才来到码头,急急忙忙雇了一条小船赶上大船。这次同船的人多数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如蔡畅、蔡和森、李

富春、何长工等都在那条船上。船名“Eudre Labin”。我们这些学生没有正式铺位，遇到急风骤雨，临时到货舱去躲一躲。平时就在甲板上呆着。船刚出吴淞口，就颠簸起来，许多人晕船、呕吐，不能进食。我和极少数几个人照常吃东西。船上的伙食很坏，给我们吃一种方形空心饼干，咬开一看，里面都是小虫。午饭、晚饭吃的都是牛肚子里的杂碎。同船的人极不满意，提出抗议。我们到了巴黎才发现，上海经手买船票的洪某在每人 125 元船费中贪污了 25 元。

我在船上丢了一个提包，里面有我在江苏省运动会获得的五六块金、银奖牌。查询结果，金谓船停西贡时，可能有小偷上船把它偷走了。

船过红海，又颠簸得很厉害，天气闷热得很，令人受不了。下雨时，我和几位不晕船的人，不愿意钻进货舱，仍在甲板上，用毯子顶在头上挡雨，大家唱歌，别有风味。双十国庆，在船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会，我和曾琦等还讲了话。从上海到马赛走了 35 天，上岸后住在兵营里，然后坐火车到巴黎。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巴黎转往伦敦。和我一同去伦敦的，除了张峻外，还有一位姓马的，是吴稚晖的外甥。我们到了伦敦以后，由陈源带我们去吴稚晖家，陈吴两家是亲戚。吴妻是一位旧式老太太，不懂英文，一个人住在楼上，很少下楼，儿子在伦敦高级职业学校读书。我们会见了吴太太，致问候之意，并谈了一些吴稚晖在国内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以后我没有再去吴家。

我在伦敦住在 Balhan 的 Cavendish 路 147 号一位工人家里。这里原是丁西林的住处，他去巴黎了，我接着租住，一共两间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兼会客室。我就在这里准备入学考试。房东老太太对我很好。1945 年 10 月，我从美国飞伦敦，还去看过这所房子，房子和环境依然如故，而房东老太太和他的子女早已迁往别处去了。

住定以后，晚上补习英文。老师是个演员，他用剧本做教材，有

三四位学生一同学习。

陈源的英文比较好 曾在伦敦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在送去发表之前请位写作相当好的老太太修改一下。我也曾写过三四千字的小说两篇 发表在《新时代》(New Age)杂志上。《新时代》是一份有名的杂志,它的主笔还约我去吃过一顿饭,给我不少鼓励。

1919年10月 我考取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读了三年——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2年下半年;读完后进入牛津大学继续研究经济一年多 直到1923年底。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第一年学的是基础课。第二年读选课 规定要有一位导师 我的导师是当时有名的拉斯基先生。那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授课的多半是著名学者 如韦伯夫妇、华莱士、霍布浩斯、院长贝维利支等都是费边社的名人。此外 还有罗素、可尔、皮古、凯恩斯等 他们有时也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当然是批判地讲。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艾德礼当时在该院当讲师 (Lecturer)。肖伯纳 H. G. 威尔斯有时也来校讲话,主要是宣扬改良主义和中间路线。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费边社的大本营 该社的名人、负责人都在那里。

费边社 简单的说 是英国的一个改良主义组织 历史相当久,成立于1884年 是韦伯夫妇等人所创办 鼓吹和平转入社会主义。

在伦敦读书时 我迁居到郊区 每天一早到学校去 坐公共汽车要三刻钟。那时郊区生活费用相当便宜 房租也比较低 每周30先令 包括早餐。我住的那所一楼一底的房子 上下各三间 我租了楼上两间 附带卫生间。当时英国的普通工人 生活也还过得去。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对殖民地进行掠夺,在世界范围内攫取高额利润 在本国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工人福利费 同时还豢养一批工人贵族。这是改良主义在英国的政治基础。

那时候中国国内军阀混战 国家贫弱不堪,一般英国人看不起

中国人。有些英国小孩子，看到中国人就唱一种侮辱中国人的歌“Chin Chin Chinaman……”。要是你英文讲得好一些 衣服穿得整齐一些，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日本人。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 担任过学生会干事。那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有从日本去的，有从苏联去的，有从亚非欧美其他各国去的 印度、埃及去的学生特别多。由于我是学生会干事 经常和他们接触，觉得他们思想一般比较进步，对当时所谓列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残酷剥削，无不深恶痛绝。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许多同学自动集会开展辩论，各抒己见。学校当局从不干预。

我在国内就爱好体育运动，就球类而言，参加过省级足球比赛。伦敦学院的足球队 我排不上。我喜欢打网球 打得不算好 田径赛方面，只有跳远的成绩还可以。我曾参加过一次大学运动会，得了第二名。我对室内游戏和娱乐都不喜欢，在国外五年，始终对桥牌等毫无兴趣，跳舞也不会，星期日常跑旧书店，看到便宜的书就买。

在伦敦看名剧演出，买便宜票就得排长队，常有人带只小凳子 在买票处坐等。

每年夏天放暑假，假期两个多月，中国学生有的到欧洲大陆 法、德等国去旅行。1920年，我去过法国；1921年 去过德国。

1920年夏季 我在法国度假 战后法国的东西比较便宜 在巴黎住两个月，比在伦敦花的钱还要少。当时国内金法郎案正闹得凶。北洋军阀政府的驻法公使陈籙是一个典型的老官僚，对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向不负责任 大家对他早就不满。金法郎案发生 学生到公使馆请愿 他避不见面 学生气愤极了 召开大会。陈籙派公使馆参赞王某出来解释，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法国警察赶来，学生才散去。

巴黎的气氛跟伦敦不同。在伦敦，特别是所谓上流社会，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 规行矩步。法国乡下相当保守 但在大城市里，

特别是在巴黎 花样之多 令人眼花缭乱。王宠惠、郑毓秀当时住在巴黎。我和陈和铎、魏道明、吴品今、梁启超的门生 住在郊区。魏道明相当聪明 王宠惠赏识他 郑毓秀喜欢他 后来魏、郑结了婚。这两人一直依靠王宠惠，回国后官运亨通，魏道明当上司法部长，郑毓秀当上立法委员。陈和铎讲究形式 是绅士派 回国后做过江苏省政教厅厅长。吴品今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

20 年代初，在巴黎中国学生中有一派信仰共产主义，组织各种革命活动 不少人后来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新中国的缔造作出了贡献。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选了法文作为第二外国语 在巴黎度假时又补习了一些法文，但没有学好，只勉强能用字典看书而已。我爱好文艺 在巴黎常到卢浮宫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去。那时我很想根据所见所闻写一长篇小说，但没有写成。

1921 年夏季 我去德国度假。那时德国限制外国人入境 对学生审查尤其严格。经过一番努力，我才得到签证。战败后的德国，通货膨胀 民不聊生 大学教授都吃不上饭。这年我在柏林住了一个多月 又到基尔住了两个星期。熟人俞大维、陈寅恪、金岳霖、吴经熊等人都在柏林。当时留德学生分两派 新派进步学生和旧派守旧学生 斗争相当剧烈。为了夺取学生会会址 甚至动武。章士钊在政治上失意后 先到英国 后到德国。他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讲师史密斯同班 我住史密斯家时 章同来闲谈。我到柏林度假的时候 章也在那里。那时马克贬值 他把英镑存款全部换成马克 结果吃了大亏。在柏林 有些中国学生家里有钱 在德国就很阔气 瞎花钱 我实在看不惯。

1922 年夏季 我在英国勃来登度假一个月 又在好友 Parsons 家住了一个月。他家在伦敦乡下租有一所小房子 邀我去住。他父母都是和蔼可亲的老人，英国工党的活动分子。1945 年和 1948 年 我两次重访英伦 没有打听到他们家的下落。我在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读书时，还有一位同窗好友 Robbins。他后来成为很有名的经济学家。Robbins 学识渊博 文艺方面造诣尤深 我在欧洲文艺上的一些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和我同年，那时还没有结婚，有时他约我去他未婚妻家，他的岳父是国际上有名的记者 A. G. Gardiner 也是英国自由党的重要人物。在 Gardiner 家里 什么都谈，给我很多启发。1945 年和 1948 年，我重访伦敦时，Robbins 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教授，写了许多书，受到人们的尊敬。由于他的关系，自由党邀我做名誉党员，我没有接受。

总的说来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三年的确学了不少东西。英国提倡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不只钻一门 要求博闻广记，为的是使学生胸襟开阔。这一点我认为有一定道理。

读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我进入牛津大学。在牛津一年半 做了一些经济研究工作。那时牛津整个空气比较保守，讲究形式。进饭堂用餐，都得穿黑色学生服，我很不习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切东西都在变。就我所知 从 20 年代中期起 牛津起了较大变化，那时我已经离开牛津了。

在牛津，我活动不多。牛津大学有一国际俱乐部 (International Club)，经常邀请名人演讲，每次要推举一个学生当主席，我担任过一次主席。20 年代，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只有 60 多人。牛津大学费用较大 入学考试较难 因此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到 10 人。在牛津，我认识了利铭泽，以后成为挚友。当时利铭泽兄弟姊妹一家都在英国 他在大学一年级 攻读土木工程 我则读经济。我们学的科目不同，但同样关心国事，同样渴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1923 年，在我离开英国的时候，送他一张照片，并写了两首仿照歌行体的小诗：

三年涕泪洒秋风，国步多艰吾未东；
莫诉胸中无限事，一声唱彻夕阳红。

大风起兮白云飞，壮士悲歌兮不得归，
安得扬戈兮返夕晖。

这两首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

利铭泽家是当时香港的首富，现在仍然是香港的大财团之一。他在取得英国籍以前，是香港议会华人首席代表。他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香港前夕，他抛弃全部财产，什么都不带，偕同母亲、兄弟姊妹全家飞到重庆，生活很简陋。日本人从香港败退后，他回到香港，收回了全部产业。利铭泽满腔热忱地期望抗战胜利后，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祖国建设。不料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他感到非常伤心，入了英国籍，英政府给予他爵士头衔。60年代初，他和夫人黄瑶碧来祖国内地参观访问，对祖国的建设成就，感到鼓舞。第一次来北京，他夫妇和我夫妇老友重逢，忆旧话新，无比欢畅。他看到祖国正在四化征途上奋勇前进，青年时代的理想，不久将成为现实，无比兴奋。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力，帮助祖国建设，在香港、九龙的水、电、海底隧道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广州的花园饭店也是他集资盖起来的。凡是有关祖国的事，新华分社、《大公报》等托他，他一定努力去办。利铭泽为人非常诚恳，办事负责，与我国领导人叶剑英、廖承志、杨尚昆等都比较熟。现在中英两国对香港问题已达成协议，香港主权收回有日之际，利铭泽不幸于1983年6月突然逝世，失去了在这未来关键性的年代中继续为祖国、为香港作出更大贡献的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当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同时在那里读书的有：李四光、丁西林、陈源、周鲠生、刘秉麟、周炳麟、傅斯年、俞平伯、张道藩、罗家伦、段锡朋等。不少留美学生到英国来求师访友，我接触过的有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徐志摩等。由于我在离伦敦去牛津以前担任过中国留英学生会干事，接触的人相当多。总的说来，他们读书比较用功，除极少数几个，如张道藩等对政治感兴趣外，一般都忙着

读书 不参加政治活动。

第五节 赴美日考察

1923 年，北洋政府派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到英美日本考察实业，考察团的秘书长是朱忠道（朱是美国哈佛大学有名的高才生，1937、1938 两年担任资源委员会设计处处长，1945、1946 两年在宋子文当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时候，担任该院副秘书长，负财经方面决策的责任）。由于我家和张謇是世交关系，他希望我和张孝若从英国一起考察 但不居任何名义 我欣然允诺。在英国 到了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几个城市 看了纺织、造船等工业。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工业有雄厚基础，但设备比较陈旧，管理方法老一套 英国工人的生活不算好 但也过得去。

由英国到美国，我们坐的是当时最大的海洋轮船伊丽莎白女王号。这条船原是德国的军船，5 万多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利品 被英国没收 改为客轮。我们坐这条船横渡大西洋 遇到很大的风浪，饭厅桌子都被掀翻了。船到纽约上岸。后来又依次到了芝加哥、费城、洛杉矶、底特律、西雅图等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它所属的工厂，设备比较新颖，管理办法比较先进，员工福利也比较好。从西雅图坐轮船到日本。在日本一个多月 我因病没有积极参加考察。这次我在英、美、日考察工业总的印象是，英国工业已陈旧，美国工业是后起之秀，日本工业仿效德国的多，独创的少。张孝若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受到重视，在英、美、日三国受到政府首脑的接见 政府各部门热情招待 日程排得满满的。考察回国 到了南通 全城出迎。张謇 排行老四 和他的哥哥张霖 老三 在南通创办的企事业包括盐垦、纺织、银行、航运、教育 几乎无所不包 可是到了他们晚年 却都濒于破产。张謇逝世 我送了一副挽联：“成败由天 毁誉由人，一生经济文章 都从

实业做起 细行不矜 大德不渝 盖世功名事业 那堪浊浪淘来。”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1922 年秋 在我从伦敦到牛津的时候 正值华盛顿会议开会。会议使我大失所望。华盛顿会议是美、英、法、意、日五强搞的 后来葡萄牙等国也参加了。当时所谓列强 勾心斗角 在远东都想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所谓九国公约、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不过是列强共管中国的代名词 无非彼此分赃而已。当时我国内乱不已，每个军阀无例外地都有帝国主义作后台。那时的爱国青年 无不感到悲愤。我对孙中山先生十分钦佩 但又感到他没有实力 没有实力也就赶不走帝国主义 打不倒军阀。我在英国的时候 刘纪文来到伦敦 和我谈到国民党 谈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我总觉得不容易成功。当时我就听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 年更看到中共发表的“二大”宣言这一重要的文献，详尽分析了我国国内形势 明确主张消除内乱 打倒帝国主义 我由衷钦佩。但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 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又不清楚 因而对中国前途 深感茫然 只留一点心愿 就是工业救国。前面谈到在牛津赠利铭泽的仿歌行体的两首小诗 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现在回想 这两首小诗既流露对国难的忧虑 也抒发了“扬戈返夕晖”的抱负 但对如何救国救民 却不知如何着手。

我出国读了四年书 思想方面概括起来是这样的 戊戌政变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辛亥革命我认为很伟大 但总觉得孙中山没有实力 改造旧中国 前途相当渺茫。至于我以后走工业救国的路 乃是与幼年家庭、中学和在英国所受的教育有密切关系的。

第六节 留学归国

我和张孝若等人回国后，由于我认为中国要富强，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又由于美国工业比较先进，认为应该寄希望于美国方面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与此同时在国内找个实力派来实现工业救国的